

當民族誌遇到後人類： 數位田野中的拼裝與關照*

李梅君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

數位民族誌因應著二十世紀下半葉數位科技的快速發展而生，它挑戰了過往田野工作要長時間身處一地的預設，甚至打破了物理空間的想像，讓參與觀察可以跨越實體空間遠距發生，也讓參與的身體不再受肉體所限。透過打破線上／線下、虛擬／實體的二分，數位民族誌確立了其作為人類學的重要課題。但是過往的數位民族誌仍然是以「人」作為行動者主體、「科技」是被動的物與客體，忽略了在當代田野的多重時空與碎形化下，田野工作者賴以參與觀察的身體五感是藉由數位科技而延展、擴充、分身、和瞬移的賽伯格（cyborg）身體；同時，所研究的對象也不再是以個體的人及其集合作為基本單位，而是與和各種非人與技術物的拼裝、異質元素集結的混種。在本文中，我引入女性主義後人類理論來重新思考田野工作者如何藉由將非人與物納入研究關懷，並且認真看待研究者帶入田野的身體與物質、處境與行動如何促成我們的田野經驗，從而超越過往以人類中心論的民族誌書寫，並重組數位田野中人與物、主體與客體、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女性主義

投稿日期：2023年9月12日 接受出刊日期：2024年10月2日

*謝詞：本文發展自筆者於2022年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年會，發表在「在電腦前面做田野：人類學家與報導人的線上／線下互動」場次的論文。感謝籌組人鄭肇祺的邀請與號召，以及同場次發表者謝竹雯、張正衡、賴奕諭，和評論人蕭季樺，對本文所提供的各種建議與討論。本文對民族誌方法的探討奠基於我在2014到2024年間，橫跨十年對公民科技社群零時政府所進行的研究。零時政府參與者在田野期間對我提供的協助、陪伴、與照顧催生本文，在此表達由衷的感謝。本文對田野的許多反思也來自於過去兩年在各地進行的「數位 x 民族誌」專題演講，謝謝參與的老師、同學們對我的提問和回饋。我的助理劉旭鈞在本文撰寫過程中亦提供寶貴的編修建議。最後，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在本文修改的過程中，不吝提供對本文精闢的批評指教與修改建議，讓原本不夠成熟的文章能夠進化為足以發表的面貌。

後人類理論不只為數位人類學帶來本體論與知識論上的新視野，更敦促田野工作者採取一種「關照」的倫理批判與實作，在與田野中的人、物、資料、技術、與數位互動交纏的同時，接納片段而充滿缺陷的田野工作者自身。

關鍵詞：數位民族誌，女性主義後人類理論，拼裝，照護，田野

一、前言

2015年暑假，我坐在臺北家中的沙發上陪母親看著不知道第幾遍的肥皂劇。我的大腿上是一臺筆電，透過家中的無線網路連上了數個線上平臺：臉書、Slack、Hackpad、GitHub，一層又一層疊加在2D的螢幕上，只需我在鍵盤上按下快捷鍵便可來回切換。

那年我即將升入博士班三年級，暑假回臺灣進行田野地初探。我的研究主題是公民科技如何在技術與政府之間轉譯「開放」，研究對象是臺灣公民黑客社群「g0v零時政府」（以下簡稱零時政府），一群試圖「寫程式改造社會，拆政府原地重建」的黑客（hacker）。零時政府是一個組成鬆散、強調去中心化的「社群」。它沒有一定的結構與中心，也無固著的地理空間。參與者平時以各種數位平臺串連，偶爾在晚間或週末假日透過實體的聚會、黑客松、或研討會交流協作。臺北是多數活動舉辦的城市，但也有許多的例外發生在臺灣其它地點（例如臺中、臺南），甚至是海外（例如日本沖繩、美國紐約等）。真正常存，但也總是在「更新」的田野地，就是展開於我眼前螢幕裡的網路世界，包括社群媒體、通訊軟體、協作平臺、影音直播等。它們提供我即時地與參與者互動的媒介，或者具有時間差地向我展示零時政府參與者的足跡。隨時隨地，只要有一臺可以連上網路的數位裝置，我就能登入田野，這是多少田野工作者的夢想啊！

但真正開始這個田野後，我才知道數位田野對田野工作者帶來的挑戰。那個暑假，坐在沙發上的我並不自在愜意。我既有些焦躁，又有些漫不經心。焦躁來自於數位田野的形狀抽象、摸不著邊際，和我過去所閱讀的所有民族誌都大不相同。我無法住進某個報導人的家、畫出一個村莊的系譜、實地踏查報導人的生活環境、或是在精進一個陌生的語言過程中學習當地的象徵符碼與儀式祭典。相較於經典民族誌中描繪的田野經驗，我甚至沒有每一天都與我的報導人實體相處在一起。並非我不願意，而是零時政府參與者本來就沒有如親屬或部落般的共同生活。因此我時常在質疑自己：這是田野嗎？我這樣算是參與觀察嗎？

但焦躁的同時，我也有些漫不經心，那是數位田野中常有的狀態。我的報導人所處在的網路空間極大程度地與我個人的空間交疊。我們互相加彼此為臉書好友、追蹤彼此的Instagram帳號、在Slack平臺上對話、用Hackpad（後來改為HackMD）編寫共筆。這些數位平臺不同於地理空間上的異地，我的個人生活無法因為物理距離而被淡化。當我滑著臉書上零時政府粉專或是參與者的發文時，我同時也會瀏覽到我家人的動態、朋友的照片。而當我在相對專屬於零時政府的平臺上，比如零時政府的Slack工作空間或是Hackpad共筆上時，我的身體可能處在屬於我個人的生活空間——家、學校、我習慣拜訪的咖啡廳——之中。這種田野工作大規模介入私人生活（或是反之）的狀態，是數位田野的常態。二十四小時的交疊，讓數位田野不總是永遠高強度的參與觀察，而是如同當代的數位生活，我們偶爾多工並行地忙碌，偶爾漫不經心地瀏覽。我是這樣，我的報導人也是這樣。從這個角度看，我已經涉入零時政府參與者的集體經驗之中。

我的田野經驗反映的是伴隨著二十世紀下半葉數位科技快速發展而誕生的數位民族誌。數位民族誌是人類學中新興、且仍在成長的領域。在本文中，數位民族誌指的可能是以數位科技及其所形塑或改變的人類文化社會為主題的研究；或是利用數位工具遠距進行參與觀察的民族誌田野；但更多的是上述兩者的結合——因為所探究的題目與數位科技緊緊纏繞，因此在研究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沉浸在數位空間之中，並且採用科技工具與方法進行田野。數位其獨特之處，便是它具有超越物理時空與個體肉身的侷限，如同蟲洞一般將人事物跨地域、跨時差地串連起來。透過網路，數位打開了虛擬時空的大門，讓人們沉浸其中，因而得以展開新的連結、深化原有的社會關係。而數位田野挑戰了過往田野工作要長時間身處一地的預設，甚至打破了物理空間的想像，讓參與觀察可以跨越實體空間在遠距發生，也讓參與的身體不再受肉體所限。數位民族誌不只讓田野地變得開放、失去邊界，時而沉浸、時而抽離的數位連結更成為田野工作的嶄新挑戰。

本文將從我的數位田野經驗出發，並回顧從網路誕生之初到數位科技遍地開花後相關的民族誌研究。過往關於網路的人類學研究透過打破線上／線下、虛擬／實體的二分，確立了數位人類學作為人類學的重要課題。但是這

些研究仍然是以「人」作為行動者主體、而「科技」是被動的物與客體，忽略了在當代田野的多重時空與碎形化下，田野工作者賴以參與觀察的身體五感不再受限於有機體的邊界，而是能夠藉由數位科技而延展、擴充、分身、和瞬移的賽伯格（cyborg）身體；同樣地，所研究的對象也不再是以個體的人及其集合作為基本單位，而是與和各種非人與技術物的拼裝（assemblage）、異質元素集結的混種（hybrid）。在本文中，我引入女性主義後人類理論（feminist posthumanism）來重新思考田野工作者如何藉由將非人與物納入研究關懷，並且認真看待研究者帶入田野的身體與物質、處境（situatedness）與行動如何促成我們的田野經驗，從而超越過往以人類中心論的民族誌書寫，並重組數位田野中人與物、主體與客體、研究者與被研究的關係。女性主義後人類理論不只為數位人類學帶來本體論與知識論上的新視野，更敦促田野工作者採取一種「關照」（care）的倫理批判與實作，在與田野中的人、物、資料、技術、與數位互動交纏的同時，接納片段而充滿缺陷的田野工作者自身。

二、與黑客一起做田野

如同本文開頭描述的場景，我的數位田野從沙發上開始。在夾雜著焦慮緊張與漫不經心的線上瀏覽後，我終於在每天查看的零時政府聊天室平臺Slack上，迎來了一個更深入「田野地」的機會。

零時政府的參與者最早使用Internet Relay Chat（IRC）作為聊天的平臺；直到2014年中，兼具聊天室與協作工具的應用程式Slack誕生，零時政府便移動到Slack上開設工作空間（workspace）。在g0v的工作空間裡有上百個以hashtag（#）開頭的頻道（channel），是各專案和興趣群體的聊天室，其中#general頻道是所有參與者共同分享的空間。某日，當我在流覽聊天室時，看見了nchild¹留下的一則訊息：「剛出爐的佳節翻譯坑，希望下次大松能應景完

1 在零時政府的聊天室裡，人們習慣使用首字小寫的英文網路ID互相稱呼；本文依此習慣，以網路ID來稱呼我的田野伙伴。使用網路ID一方面能展現數位民族誌的過程——亦即我們的互動及社群網絡是建立在ID之上，而非其「本名」，即使是在實體的互動中，我們多數時也以ID稱呼彼此。

成，請大家踴躍參與！」並附上這個專案（也就是他口中的「坑」）的共筆連結。共筆裡說明這個專案希望能將一本開放授權的資料視覺化英文書，用數位協作的方式翻譯為中文。參與者可以在共筆上自主認領章節，並依共筆的指示在協作平臺GitBook上進行翻譯。我認領了幾個章節，並以這個專案為藉口私訊nchild，請他指導我如何使用GitBook。透過這個專案，nchild引我進入了零時政府的黑客松，讓我從一個潛水的旁觀者變成零時政府的參與者。

2015年8月底，我來到了臺灣零時政府第拾伍次資料科學黑客松。在黑客松現場，那些我從聊天室、共筆、過去活動影像紀錄裡所看見的網路ID，忽然都有了實體的形貌。會場裡，年輕的參與者身上穿著各個技術會議送的活動T-shirts，人手一臺貼滿花花綠綠貼紙的筆電，安靜地佔據在會議室的不同角落。看見彼此進來後，他們或是點頭示意，或是簡單寒暄，然後便打開筆電敲打著。每兩個月舉辦一次的黑客松，現場並沒有我想像中許久未見的喧騰，也沒有其他像我這般殷殷企盼活動開幕的人，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彷彿身處於共同工作空間之中的氛圍，好像每個人手頭上都有待完成的任務，來這裡尋找一種既在一起、又可以獨立專注的空間。我和其它人一樣找了個位子坐下，打開我的筆電，但好奇的眼光不停掃射整個空間。那是那個ID是moon_c的設計師嗎？那個人似乎是活動影片中常常出現的面孔？筆電上的貼紙好像都有特別的意涵？

正當我還在消化眼前的場景時，打破這靜默場景的是由poga帶來的新手教學簡報。在三分半的時間裡，poga對我們這樣的「新參者」（意指：第一次參與黑客松的人）演示了如何操作今天會用到的各種數位平臺、怎麼提案、怎麼寫共筆、怎麼協作。我趕緊跟著打開一個又一個的視窗，發現活動共筆上已經登入許多虛擬頭像，大家的游標在不同位置上移動，有的正在編輯，有的靜止不動，提案列表已經被填滿。原來，在安靜的鍵盤聲之中，對話與互動早就在數位空間裡悄然開始！

值得一提的是，網路ID並非完全匿名，本研究並不刻意匿名，因為所研究的對象擁抱開放的精神，並且強調正確的引用以及給與參與者應有的認可。在不匿名的狀態下，本文已排除敏感的個人資料或不適宜公開的故事。

活動正式開跑，零時政府的創辦人clkao上臺向大家問好，開頭先提示今天的黑客松由零時政府和臺灣資料科學年會共同舉辦。在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館三樓，一間會議廳裡是穿著正式服裝的學術工作者，和走廊之隔滿滿宅T的黑客松現場形成強烈的對比。簡單開場後，是黑客松的重頭戲：pitch（意指：提案）。在活動的行前通知裡，參與者已經收到活動協作平臺Hackfoldr的連結，裡面有用來登記提案的Google Spreadsheet表單，讓與會者自主填寫。從表單上看來，今天一共有18個提案，各組提案人將輪流上臺用三分鐘介紹自己這次黑客松要做的專案，並且邀請擁有不同技能的參與者加入。這些我曾經在活動記錄影片中看到的畫面終於化作我眼前的現實了。

在零時政府的黑客松，專案團隊是不停變化成形的。提案者不需要已經組成團隊再來報名，而是可以透過黑客松的現場尋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參與者也可以在不同專案間移動。要讓人願意留下來貢獻，pitch是其中重要的關鍵。pitch一詞來自矽谷科技產業，意指一個人如何在搭電梯這般短暫的時間裡，讓完全不認識的人，快速的理解想法並且推銷自己或產品。這種pitch的「創業文化」（entrepreneur culture）是矽谷精神（English-Lueck 2002）的展現，也是黑客松活動的基礎。一個黑客松的現場正是從pitch（提案）到hacking（動手作）到prototyping（產生雛型）的過程。

Pitch點燃臺下零時政府參與者的熱情。一個又一個的電腦術語和宅語言交織著對當下臺灣政治的嘲諷，以及如何用幽默、好玩的方式來介入政治並提供解方。提案者無不絞盡腦汁，用梗圖與黑話來激起參與者對於其專案的興趣。不同於開場前的寧靜，提案者常常一句話、一張圖就能引來哄堂大笑。pitch並非是單向的傳播，而是雙向的來回互動，觀眾的反應與笑聲影響著提案者的「表演」。精采的提案會得到滿堂掌聲，太過冗長的提案則會被「超級瑪利歐」音效請下臺。²聊天室也沒閒著，充滿了即時互動的顏文字³「++」（表

2 每組提案人僅有三分鐘的提案時間，時間一到，便會響起「超級瑪利歐」遊戲中的game over（角色死亡）音效，將提案人請下臺。

3 「顏文字」是一種利用鍵盤上的符號、字母和數字組合而成的表情符號，其排列方式通常模仿人臉的形狀，因此得名。透過不同的符號組合，顏文字能夠表達各種情緒，如喜悅、悲傷、驚訝等，使文字交流更生動、有趣。

示讚美)、「www」(表示笑聲)、「\ /」(表示歡呼)，無聲但熱鬧地與提案者互動著。在一個多小時高強度、資訊量爆炸、且多平臺同步的提案階段後，我已經精疲力盡，而黑客松的活動才揭開序幕。

提案後，為期兩天的hacking正式開始。此時，參與者可以自由移動、交流、並且找到自己有興趣的專案參與。當人群開始離開座位活動時，我終於有了機會和參與者互動。我先找到了我參與的翻譯專案坑主nchild聊了幾句，說一說今天可能做哪些校對；然後又去搭訕「自主生產計劃書產生器」的坑主ipa，和身為孕媽媽的她聊了兩句生產的大小事；再跟隨其他參與者在每次放飯時湧上食物區，站著啃食披薩炸雞，並和身邊第一次見面的朋友打開話匣子。每一次看見新面孔，我都在腦海中搜尋她／他掛在脖子上的ID。這些我再也熟悉不過的線上參與者，原來留著一頭長髮、原來喜歡打扮成蘿莉塔風格、原來有點害羞、原來是個貓奴。黑客松讓我的數位田野豐富了起來，讓我有機會拼湊參與者的多元樣貌，並且打開一扇我和他們在未來成為伙伴的大門。

偶爾，我會坐回位子校對翻譯計畫，也逛逛線上聊天室，看看什麼話題在網路上發酵。正是此時，nchild走過來告訴我他隔天無法繼續參加黑客松：「明天黑客松最後有發表，會在隔壁資料科學年會的場合上，你就上臺分享一下我們專案的進度吧！」我大吃一驚！我還在理解這是個什麼樣的場合，還沒拋掉自己研究者的包袱，就要我站在資料科學年會的舞臺上，用零時政府參與者的姿態說話嗎？他沒有理會我的驚恐，倒是很平和的提醒「別忘了最後要找更多人一起來加入」，然後就提前離開了。從他離開那刻起，我的「做田野」心態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顧不得找人說話、觀察現場、收集資料了——我投入在翻譯校對中，並且開始編寫報告的簡報。為了讓自己「更像」參與者，我看了過去發表的影片，揣摩要說什麼、要怎麼說。等到我回過神來，自己已經站在數百人的資料科學年會會場中，點開我的投影片：「目前，我們已經有十六個人填坑，只剩三個章節未完成。但除了翻譯外，我們還需要有校對的人……」。是的，「我們」，在兩天的黑客松活動後，我已經從坐在沙發上焦慮不知道如何開始田野的人類學家，變成了參與在零時政府黑客松中的「我們」了。

從加入翻譯計畫，到線上聊天、在平臺上協作、參與黑客松吃吃喝喝聊天、最後走上舞臺分享，我慢慢領悟到研究這個強調「你就是『沒有人』」、「協作」、「行動主義」的社群，關鍵就是實際參與其中，主動「跳坑」（參與專案）、「填坑」（完成專案）。而這種田野模式，形塑了我對數位民族誌的反思與實踐。

三、從「網路」到「數位」

從1990年開始，網路與數位科技快速發展並進入日常生活的每個縫隙，使得人類學家也開始關注此新興科技引發的社會變化。正如數位科技日新月異，「這個」領域並不容易被輕易定型，而是隨著網路與數位的變革產生不同的範疇，來捕捉科技對人們的社會生活與文化習慣帶來的影響。這些範疇包括網路民族誌、虛擬世界民族誌、社群媒體民族誌、手機民族誌、數位民族誌等。在進入女性主義後人類理論對民族誌的啟發前，本節將爬梳相關的人類學文獻，來呈現人類學如何一步一步從討論「網路空間」是否能作為一個新的田野「地」，逐步證成其可以做為獨立的田野題目，並推翻線上／線下、實體／虛擬的界線，然後轉向「數位」作為社會生活的基礎建設與媒介物，對我們的感官、認知、與人際互動產生徹底的改變。

2000年前後，人類學家開始注意到網路上產生的社會網絡與文化群體，催生對於「網路民族誌」的討論（Ethnography of the Internet or cyberspace，例如Escobar et al. 1994；Miller and Slater 2000），試圖釐清網路作為一套世界性的科技（cosmopolitan technology）究竟是全球普同的，或是地方各異的？網路如何參與並形塑全球化的樣貌，又如何創造出許多地方與群體的獨特變形？從這些對網路的提問，可以看見人類學家在其原本的田野中與網路不期而遇產生的火花。

Daniel Miller和Don Slater於2000年出版的*The Internet*，可以說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他們用中美洲的千里達為例，指出不能將網路視為一種外來的媒體，而是需要考察網路在千里達的獨特樣貌，了解網路如何緊緊鑲嵌在千里達

文化之中，甚至「使用網路已經融入成為千里達人的一環」（Miller and Slater 2000）。Miller和Slater的研究的世界或整體，強調網路是連續的，且鑲嵌在其它社會空間之中。網路帶來的是新的媒介方式，而非新的真實（reality）。從Miller和Slater以降，反對真實／虛擬、線上／線下二分成為人類學切入網路與數位科技的基調。從這個基調出發，人類學家開始探問：由科技中介的文化有什麼特性？線上與線下的社會關係如何互相影響？此時，因應網路而興起了許多新的社會關係與人際網路，成為人類學家研究的對象。

首先，人類學家轉向因網路而產生的遊戲世界與社群媒體。像是Tom Boellstorff（2008）對虛擬世界遊戲「第二人生」的研究，除了指出線上遊戲是一個具有其文化特殊性的田野地之外，也強調人類作為一個具有創造力的生物，正是透過「虛擬」（virtuality）的創造力來建立社會、產生文化。在此邏輯下，虛擬並非與真實對立，而是真實之所以實現的重要動力。而「第二人生」的特殊性在於它的虛擬是由科技所中介，使得它與所謂的「現實世界」產生特殊的張力。Bonnie Nardi（2010）針對多人角色扮演遊戲「魔獸世界」的研究，則延續Boellstorff對於虛擬世界具有其獨特文化的立場，也同樣強調遊戲之外的社會關係——性別、階級、國籍等——也會對遊戲內的互動產生影響。

在虛擬時空與遊戲研究的基礎上，人類學家進一步去探究在網路與社群媒體上所創造、發生與轉變的社會關係，並產生內容十分多元豐富的研究。例如：研究網路如何促成協作式的社群文化（Coleman 2013; Kelty 2008; Karanović 2012）、觀察人們如何透過臉書小遊戲「開心農場」建立起友誼（Miller 2011）、分析親密關係如何透過社群媒體「分手」（Gershon 2010）、探討青少年對社群媒體的上癮以及網路霸凌的問題（Boyd 2014）等。人類學家揭露了網路上各種關係的維繫、轉化與深化，對「媒介」與「連結」有了更深入的探討。

上述的研究雖然都提及線上與線下的互動，但是研究的重心仍然以網路世界為主。除此之外，人類學家也開始關注使連線得以可能的物與基礎建設，像是手機、遊戲機、智慧家電、資料中心、甚至是用來製作數位產品的礦物（Ito, Okabe, and Matsuda 2005; Johnson 2019; Maurer 2012; Pink 2020; Schüll 2012; Smith 2011），都成為人類學家切入數位的不同題目，進一步揭露數位作

為分散式的現象，並沒有一個明確的中心，而是分散的物質與平臺、人群與機器。近來對網路的研究已經無法與智慧型手機的討論分開，對許多電腦相對晚進才普及的國家與地區，手機幾乎就是網路的代名詞。Ito, Okabe, and Matsuda (2005) 對日本青少年使用手機的研究是這類研究的始祖，她指出手機打破網路連線的時空限制，並帶來隨時隨地連線的可能性，但作為一個真實存在的物，手機仍是鑲嵌在日本的社會制度與文化慣習之中。這類型的研究提醒我們數位始終有其物質與身體，而非是一個脫離物理世界的虛擬空間。

在探索網路與數位工具對於人類社會關係和物質生活的影響後，人類學家進一步注意到數位科技的發展帶來政治與經濟上的巨大變革。從2000年的反全球化運動，到2010年以來的阿拉伯之春、佔領華爾街、#MeToo運動、太陽花運動、乃至反送中運動，巨大的社會抗爭浪潮藉著數位科技推波助瀾，不但連結起過往社會運動無法想像的廣大、跨地域、彼此互不相識的群眾，更透過線上與線下的互相串連造就前所未有的政治影響力。一方面，網路不僅能為受壓迫者賦權，並且能夠改變組織運動的方式，讓抗爭可以如星火般燎原（Castells 2012; Juris 2008; Postill 2018）。另一方面，另類的數位行動主義，例如自由開源軟體運動或是黑客社群匿名者，也打開新的政治空間（Coleman 2013, 2014; Keltz 2008; Tkacz 2015）。

網路雖然帶給受壓迫者抵抗的利器，但是科技的發展始終與資本的積累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曾經被視為水平連結、去中心化、開放自由的網路，也逐漸被少數平臺與科技公司所壟斷（Morozov 2011; Pasquale 2015; Zuboff 2019），或是成為集權政府監控與壓迫人民的武器（Byler 2021; Chang and Lin 2020; Sinpeng 2020）。尤其，大數據與資料科學的發展為資本主義市場帶來了新的機會並改變了全球化下的勞動關係。矽谷的創業主義（entrepreneurialism）作為新自由主義的延伸與變形，以其科技樂觀論感染全球（Lindtner 2020; Irani 2019; Zhang 2023），卻掩蓋了高科技產業背後的數位勞動、階級對立、與資源剝削等議題。近年來，已有不少研究著眼於全球再分工的血汗工廠（例如 Aneesh 2006; Fabros 2016; Xiang 2007）、性別與情緒勞動（例如 Lukács 2020）、群眾外包下幽靈勞工（例如 Delfanti 2021; Gray and Suri 2019）等議題。這些關於數位科技的政治經濟學，將是接下來人類學面對資本與資料更加集中的人工智慧時代的關鍵課題。

臺灣人類學界中有關於數位民族誌的出版尚不多。在國內指標性的人類學期刊《臺灣人類學刊》及《考古人類學刊》中，近十年（2014～2024）僅有八篇相關論文，其中七篇集中在《考古人類學刊》的「網路·人類學」專號（一）、（二）。上述八篇文章著重於討論網路以及社群媒體如何凝聚地區、少數族群與同志的認同意識（林瑋璵 2016；劉子愷 2017；鄭芳婷 2016），或是打造網路次群體的社群文化（邱誌勇 2016；蕭季樺 2017），另有一文探討擴增實境遊戲如何讓「真實」復歸（黃厚銘 2017）。網路民族誌在資訊社會學與傳播領域也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並催生出多元豐富的研究，主題橫跨遊戲（例如范國光、黃彥萍、張豫武 2012；張玉佩 2013）、性別（例如何姿瑩 2009）、兒童與青少年文化（例如管成雲 2017）、移民與原民（例如邱淑如、張維安 2011；林顯明、廖達琪 2019；張玉佩 2012）等。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數位科技發展迅速，許多新興的議題由新銳的碩博士生進行研究，因此在碩博士論文中也愈來愈多相關的研究。

除了上述面向甚廣的研究主題外，人類學家也進一步思考民族誌該如何研究網路與數位科技。Christine Hine在*Ethnography for the Internet*（2015）指出數位民族誌的三個E：透過民族誌來探查網路，讓我們去關注網路是如何被鑲嵌（embedded）在社會生活之中；線上世界都有其物質的基礎，是身體經驗的延伸（embodied）；當代在行動技術與科技基礎建設的完善下，網路與連線已融入日常生活（everyday）中各個不經意的角落。Sarah Pink等人在*Digital Ethnograph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2015）一書中，更直接強調對數位（而非網路）的研究應該採取「非數位中心」（non-digital-centric）的途徑。對Pink等人來說，數位不再只是遊戲世界、社群媒體等的網路空間，而是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基礎建設，滲透我們日常的每個角落：用手機查看天氣、在串流平臺上追劇看電影、線上購物訂餐點、Google導航等。透過「非數位中心」的視角，Pink等人邀請我們去思考，數位如何一方面無形地深入生活的每個角落，另一方面如何與我們身處的感官、氛圍、物質等元素的產生互動。

從上述的文獻看來，網路與數位科技的普及雖然才經歷三十餘年，我們可以看見人類學家對於「網路」作為一個特殊空間的思考，逐漸轉向科技作為新的媒介與技術物的討論，到以「數位」來思考這個既無形中改變我們日常生

活的感官與行為、又充滿各種物質符號的基礎建設，從此證成了數位人類學是當代人類學重要的領域。不過，當前的數位人類學研究在將網路與數位科技視為一個研究課題或範疇的同時，卻鮮少據此回頭修正民族誌理論。本文的論點是，從網路民族誌到數位民族誌的發展，不應該只停留在我們如何去捕捉這個研究課題，我們更需要進一步去思考網路與數位科技如何改變了田野工作的現場，進而打開了田野工作者的身體，並且重組民族誌田野中人與物、主體與客體、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

四、多重時空與碎形田野

由於數位科技能夠讓田野工作者跨越物理空間的距離，透過媒介物多重地打開複數個互動的空間，並且擴展田野工作者所能感知的邊界，這使得參與觀察不再限於田野工作者的肉體所到之處。數位科技消彌了空間與身體的固有疆界，其開放又流動的特質，讓「田野地」的空間感變得模糊。面對數位田野，田野工作者往往被眼前那爆炸般、錯綜複雜的資訊流與數位互動所迷惑；而數位科技作為中介，又彷彿在研究者與現場之間覆蓋一片薄紗，令原本沉浸式的體驗變得模糊不清，從而產生無所適從的感受。這樣矛盾而複雜的體驗，恰好反映出數位田野所具備的兩大特性——「多重時空」與「碎形田野」。

第一，數位田野經常是多重時空層層疊疊交會而成，挑戰著田野工作者跳轉在這些時空，既要能夠不迷航又能有所聚焦。數位田野的「現場」十分多重，經常同時在線上與線下同步展開，兩者之間頻繁互動，甚至沒有明確的界線。比方前述的黑客松，參與者經常是一邊和身旁的伙伴討論，一邊在筆電裡進行共筆記錄；當臺上提案熱烈進行時，聊天室裡則充滿著無聲歡樂的emoji和顏文字；而社群媒體上的發文經常是參與者寒暄的起點，參與者也在現場透過手機在社群媒體上tag（意指：標註）彼此，進一步延續線下的互動。當我的研究對象擁有許多數位分身在各個空間裡穿梭時，我也需要學習數位分身的技巧，才能跟上他們的時空漫遊。

有時候，數位田野的現場是以網路平臺為主，而田野工作者則是遠距地參與。但這不意味著田野地僅僅存在於眼前的螢幕之中，螢幕作為進入該田野

的窗口，背後實則由許多物理空間與基礎建設所拼構而成。當我與零時政府參與者透過Google Meet進行線上小聚時，我不僅要專注在眼前平臺上的互動現場，也需要分心地觀察：對方身處在什麼樣的空間環境之中？是哪些物質與基礎建設的存在使得此次互動得以可能？平臺的介面提供了什麼功能，又限制了哪些可能性？對方的參與是全心全意地投入，或是同時多工進行中？對方的身體姿態、面部表情、視訊背景、甚至是沒有開鏡頭所使用的大頭照呈現出何種狀態？這些身體、物質、環境、介面、與基礎建設都是構成該數位互動的一部分，也是數位人類學家所關心的對象。透過數位而中介的交流，並不一定讓人們變得疏離遙遠，反而因為數位的彈性與延展串連起更多元的可能性。

更有些時候，數位田野的多重時空極度分散，仰賴田野工作者主動串接。以零時政府來說，在沒有黑客松或是聚會的時候，參與者多半是用自己閒暇的時間上線，不同時不同地、並且延遲地互動。此時，零時政府去中心化的特性更顯突出：Slack裡有上百個不同頻道的聊天室、HackMD上數以千計的共筆、不同專案各自管理個別的程式庫和資料庫、以及參與者自己的社群媒體帳號，這些細瑣繁多的線索需要田野工作者依著不同的問題意識整理、爬梳，才能串起田野地的形狀。

第二，數位田野既零散破碎又經常滲入研究者的個人生活之中，不但讓學術研究與個人生活的界線變得模糊，田野工作者也需要花費更多心神摸索探查做田野的路徑。不同於古典人類學長時間移地於某處的田野情境，擁有行動裝置的數位人類學家其身體不必移動至異地就可以隨時上線，但這也意味著田野可能隨時發生。如同前述黑客松的場景，田野工作者常常要處理四面八方襲來的訊息，又要來回切換在線上、線下不同介面之間。雖然我們都希望自己擁有無數個影分身，可以同時參與不同的數位田野現場中，但現實是我們的心力有限，即便可以開啟無數個視窗，但是能夠真正投入卻僅有眼前的那一個。

數位田野的現場有時像黑客松那樣密集的發生，有時卻像本文開頭的沙發場景般鬆散。在我回臺灣進行博士論文田野那一年半，零時政府並不是無時無刻都有實體聚會。在沒有聚會的日子，我只能上線逛逛各個聊天室，在一個又一個的連結中漫遊。倘若當天沒有什麼動態更新的話，一天的田野可能就結束了。本文開頭裡那個坐在沙發上，焦慮的質問自己「我正在田野嗎？」的時刻

經常發生。我必須主動出擊，打開許多「田野現場」，透過參與專案、邀約訪談、進入參與者不同的工作與生活空間，積極尋找與零時政府參與者進一步互動的機會。

數位田野也經常在沒有預期的狀況下迎面而來。我們連上線的電腦與手機，也是我們與家人聯繫、接收工作訊息的媒介；我們沉浸在田野裡的社群媒體和通訊軟體，裡頭不只有著田野對象的活動，也充滿著親朋好友的動態。個人生活與田野工作之間的界線在數位田野裡十分模糊。比說，當我在自己的閒暇時間滑手機、瀏覽社群媒體的時候，常常在不經意間「撞見田野」，此時我必須馬上參與其中，並且紀錄與備份。下線了也不代表切斷了對田野的連線。手機不定期跳出通知，告訴我被tag了或是收到一則訊息，都是田野可能突然闖入我生活的方式。

上述這樣多重時空、碎形田野的田野形態並非數位民族誌所獨有，而是「在社會生活高度分化、人貨資訊高速流動、網路打造多重時空的年代」下（蔡晏霖、趙恩潔 2019：13），當代田野工作者需要亦步亦趨地隨著人群與課題移動，「穿梭於歧異的生活世界之間，學習聆聽不止一種語言，並隨時進行轉譯的工作。」數位民族誌正是站在這個挑戰的最前線。正因為數位科技大幅取消了空間的距離、加速了人事物流動的速度、並且擴展了身體的界線，它因而比起其它的人類學領域更能敏銳地察覺並且率先面對當代田野中多重時空與碎形田野的特性。

面對多重時空與碎形田野，研究迦納的網咖文化的人類學家Jenna Burrell（2009）曾提出「田野地作為一個網絡（network）」的論點。她指出，當代複雜社會的田野已與古典田野有巨大的差異，面對複雜的社會議題，田野工作者往往得隨著研究對象不斷在複數的地點之間移動，甚至面臨數位化身和有機身體的多重存在。這樣的田野現場不能再用「世界體系中的民族誌」（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或是「多地點民族誌」（multisited ethnography，參考 Marcus 1995）來描述。她提議不要把田野地思考成一個「地點」（site）或是多個地點（multiple sites），而是一個「由固定和移動的節點——包括空間、人群與物件——組成的網絡」，重新思考民族誌工作的流動性。Burrell的論點提供當代田野切入多重時空與碎型田野的方法；以網絡來

思考田野地，讓她得以靈活地遊走於線上與線下，隨著研究對象的各種身體與分身移動，而不侷限於一個田野「地」。

Burrell對網絡的想像來自她所研究的網際網路，使得她著重於思考節點與節點之間的關係如何拼湊成田野工作者探查的空間。不過，雖然她強調網絡是異質事物的連結，她卻沒有就其理論意涵深入探討。這使得她筆下的網絡顯得靜態而單薄。同樣以網絡作為關鍵型態，Bruno Latour (1993, 2005) 則提出行動者網絡理論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來發展一套突破個體與結構、人與非人、主體與客體、知識與行動二元對立的本體論翻轉。Latour反對過往對科學與技術的研究，總是以人作為唯一能動者。他描繪一種分散式的能動性 (distributed agency)，認為行動的驅力並非來自個體的自由意志，而是各種人與物異質的行動體 (actant) 在銘刻與轉譯的過程裡進入暫時穩固的網絡之中。每當新元素加入，轉譯再次發動、網絡重新調整以抵達新的平衡。

行動者網絡理論提供一個探討人與非人的本體論基礎，但由於它並非民族誌理論，因此並沒有針對田野工作的實踐與倫理問題提出見解。同時，行動者網絡理論雖然強調動態的網絡關係，卻忽略網絡中生成的情動⁴，並缺乏對權力的批判。當它將人與非人對稱相待的同時，經常掩飾了轉譯者的角色仍然多半是人類而非物。我過往的書寫曾深受Latour與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影響，但在回頭省思自己的田野經驗之際，我發現由女性主義學者所提出的「後人類主義」更能幫助我重新反思所「體」驗的數位田野，並且將女性主義對性別、身體、與處境的批判帶入民族誌田野的實踐中。女性主義後人類理論啟發我注意到，多重時空與碎型田野帶來的不僅僅是田野的型態變化了，更重要的是田野工作者和田野的關係也正在經歷本質上的改變，而這需要從後人類的身體來思考。

五、數位的後人類身體

多重時空和碎形田野帶來的是新的田野「體」驗。田野工作者賴以參與觀察的身體五感不再受限於有機體的邊界，而是能夠藉由數位科技被延展、擴

4 「情動」指的是一種身體間相互作用所激發的能量流動，超越個體心理狀態，強調關係與連結，在意識形成之前即已影響並驅動行動。正文後方將有更多說明。

充、分身、和瞬移；同樣地，所研究的對象也不再是以個體的人及其集合作為基本單位，而是與各種非人與技術物的拼裝、異質元素集結的混種。數位田野的身體經驗，帶我重新思考田野工作者如何藉由將非人與物納入研究關懷，並且認真看待研究者帶入田野的身體與物質如何促成我們的參與觀察，來超越過往以人類中心論的民族誌書寫，進一步以後人類的身體去認識我們無時無刻被中介（mediated）、被現形（materialized）、被連結（connected）及斷裂（disconnected）的數位生活。

數位是否有身體呢？數位的行動是否有其物質基礎呢？由數位所中介的社會關係如何與物質和環境、感官和情動交纏呢？我想起零時政府參與者們總是這樣開玩笑地說：「黑客松就是黑客聚在一起（吃炸雞）一直一直一直寫程式」、「沒有什麼事是一片披薩解決不了的事。如果有，就再吃一片吧！」、「吃東西吃東西吃東西，只要認真吃東西就會產生專案唷！」是啊！數位當然有身體！即使對於這些被視為最專精於程式的高手們來說，數位都不是一個沒有身體的虛擬空間。

身體在數位田野裡無所不在，但身體已經不再是自然主義下的有機肉體。行動式穿戴裝置的普及，讓人機一體的賽伯格（cyborg）躍出科幻電影成為現實。人手一臺的手機不但擴展了人類的知能與感官，也重劃了私人領域的範圍；透過穿戴式裝置進行身體的自我監測，使機器成為認識與形塑身體的媒介；或是各式VR（虛擬實境）、AR（擴增實境）、MR（混合實境）、XR（延展實境）的裝置，延展並改變了身體與認知的界限；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的發展與應用，更挑戰何以為人的界線。科技的發展不只延伸了人類身體的可能性，也模糊了有機與無機、自然與人工的邊界。也就是說，數位的身體並非是有機物的系統，它需要一種超越生物有機論的觀點來思考。

Donna Haraway的經典命題「賽伯格」和N. Katherine Hayles及Rosi Braidotti分別提出的「後人類」，皆啟發我進一步去思考數位具有什麼樣的身體。Haraway（2006）在電腦科技萌生的1980年代提出賽伯格這個人類與機器、有機物與無機物合體的後認同主體，來修正基進女性主義的本質論性別政治。對Haraway來說，作為人機混種的賽伯格挑戰了有機體的完整性（wholeness）與本質論（essentialism）、以及自然與文化的二分。在Haraway

筆下，作為混種的賽伯格不畏懼異質的融合、片段的認同，且能在衝突而矛盾的現實中，與污染、噪音共存。賽伯格直視身體與慾望，具有連結、越界、基進的創造力與可能。賽伯格既是一種存有（being）的可能性，也是一個政治的宣言（manifesto）。賽伯格並不歌頌或擁抱科技的進步；相反地，她是以「建立在一種跨越種族、國籍、性別等界線的『類同政治』（affinity politics）」

（林建光 2009：15）來反思本質論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並且抵抗由軍事工業的發展所提出的「命令、控制、通信與智慧系統」（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and intelligence, 又稱C3I）的科技發展方向。

無獨有偶，Katherine Hayles（1999）在*How We Became Posthuman*一書中，爬梳人類與科技之間不斷演變的關係。她指出數位工具和人工智慧的進步已經模糊了人類和機器之間的界線，抽象符碼與訊息模式在科技政治中取得上風，而虛擬化的身體和可以不斷擴展的義肢更改變了身體的定義。對Hayles筆下的後人類來說，身體是我們最初試圖去控制的義體（prosthesis），有機與無機是一個連續的過程而非對立的兩造。後人類並非要擺脫身體，而是要打開身體作為一個完整、有機的建構，進而串連異質的生命與物質，讓訊息與感受得以跨越有機體的邊界流通。科技的發展改變了我們對於意識與主體的理解，讓我們得以擺脫人文主義傳統中的「人類中心論」（anthropocentrism），發現事實上「我們早就是後人類」。

Rosi Braidotti更進一步地描述後人類的身體「是一個力量、流動、強度、激情在具體的空間、時間中凝聚的拼裝，被安置在『個體』的形態之中。這個緊密動態的身體並不服膺於任何內在的理性法則，也不僅是基因密碼的解譯後展示。後人類身體是各式力量在流動與變化之中，暫處於相對穩定且持續的集結狀態。」（Braidotti 2013: 60，作者譯）這裡的「力量、流動、強度、激情」具體而言正是情動（affect）。不同於情緒（emotion）強調個體可以被言明的心理狀態；情動理論推翻心智二元下的心理分析，強調身體與身體的互動、連結所激發的能量與關係，在意識前尚未形成之前產生的激情，即Spinoza談的「能夠影響與被影響的能力」（the capacity for affecting and being affected）。後人類的身體正是這種影響與被影響能力的暫時集結。

Haraway、Hayles與Braidotti的女性主義後人類理論都從數位科技的發展中，提出一種新混種的、生成的、異質的即身性（embodiment）來突破有機

生命體的完整性與本質論，並據此對當下科技的發展提出批判。不同於行動者網絡理論著重分析異質元素如何透過轉譯進入暫時穩固的網絡，後人類理論以「拼裝」來表述流變的生成（becoming）與生命力的匯集。拼裝是一個中層理論，它摒棄高度抽象、結構清楚、系統穩定的鉅型理論，著眼於異質元素的碰撞、非線性的變化（而非線性的發展）、以及不斷變動湧現（emergent）的過程。後人類擁抱非人生命（nonhuman life），以超越人類的「普遍生命力」（zoe）為中心，強調關係性的連結讓後人類主體不被物種的界線所限制，而是不停在生成的過程中，連結異質與各式普遍生命力。Braidotti認為，後人類正是「結構性他者」（structural others），諸如女權運動、反種族主義、去殖民化運動、反核和環境運動等，對人文主義中西方／白人／男性的主體建構的反擊（Braidotti 2013: 37）。

後人類主義呼應著近年來人類學興起的「本體論轉向」（ontological turn）對文化與自然對立的解構（Descola 2013; Holbraad, Pedersen, and Viveiros de Castro 2014; Holbraad and Pedersen 2017; Viveiros de Castro 1998, 2004）、「多物種民族誌」（multi-species ethnography）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挑戰（Kirksey and Helmreich 2010; Kohn 2013; Tsing 2015）、以及「多元宇宙論」（pluriverse）以拉美原住民的複數世界（a world of many worlds）來重構人類世（Anthropocene）的本體論（De la Cadena and Blaser 2018; Escobar 2017）。後人類主義拋棄本質的思考，著眼於變動的存有和多重的能動性，並強調從「過程、論述實作、和時間併現」中進行「操演式理解」而非「再現式理解」（Matthewman 2023: 301-310），這使得後人類理論能夠超越結構論與能動性、主體與客體的對立，迎向開放且未定的未來：「技術為了某些目的而重新安排這個世界，但是超越了功能與目的而邁向某些開放的東西，某些尚未存在的東西。」（Haraway 2006: 154，引自Matthewman 2023: 301-309）。

女性主義後人類理論是高度政治性的。Haraway用具有強烈政治意涵的「宣言」來為其賽伯格定位；Braidotti等女性主義者同樣用後人類進行其政治批判。賽伯格與後人類戳破純淨的、完整的、井然有序的自然主義，挑戰著人類中心論，更批判西方白人男性作為殖民者在知識上的霸權與資源上的剝削。透過女性主義的介入，後人類理論點出了混種無所不在的現實，並呼喚各種她

／他／它者的湧現與行動。後人類理論既長成於數位誕生的時代，也是對於當前數位科技失速發展的反抗，它從身體政治出發，對抗著今日資本高度中心化的科技發展、加速且全面的資料剝削與資源掠奪、和數位集權的壓迫與暴力。

後人類理論因此並非只是抽象的哲學概念，它更能作為一套分析工具來具體地揭露數位科技背後的政治。舉例來說，社會學家Deborah Lupton (2016) 研究自我追蹤的科技 (self-tracking technologies) 和它們所產生的社群。她用「活生生的資料」 (lively data) 來提醒我們個人資料 (personal data) 是從生命與身體中萃取，它們是不穩定且充滿流動，可以不斷地被各種行動者重新利用，並且回過頭來對人們的生活、行為、甚至生計產生重大影響。個人資料從來就不是「客觀的、無偏見的數據」，而是能夠產生連結、動員情感、並且擁有能動可能 (agential capacities) 的「人與資料的拼裝」 (human-data assemblages)。因此討論個人資料不能將之與人抽離，我們必須去考察這個拼裝為什麼以及如何產生，製造了什麼新的社會關係，以及為誰的利益服務。

另外一個從後人類視角檢視數位科技的例子是Lauren Wilcox (2017) 對美國在中東地區展開的無人機戰爭的研究。她指出無人機是人類、機器、和種族化與性別化的論述所交纏而成的後人類拼裝。遠端的駕駛透過無人機上裝載的鏡頭和熱源感應器「感應」到生命，再輔以大數據對此生命影像的分析，進而「看見」了可以做為攻擊目標的「成年異族男性」。這樣的無人機拼裝製造出親密的距離感 (intimate distance)，不只透過演算法對於生命模式的計算、以及遠距視覺線索的判斷，更藉由不同身體間的情動關係，讓兩種身體於此誕生：需要被保護的「我族的身體」；以及被恐懼及鎖定的「種族他者的身體」。

呼應著後人類的本體論與知識論立場，後人類敦促田野工作者考察各種異質與普遍生命力在拼裝或事件中產生何種關係、情動、與力量；它囑咐我們放下主體／客體的二分，無需去探究是人使用科技，或是科技改變人類。後人類取向的數位民族誌關注的是人與物、訊息與基礎建設、身體與物質、自我與他者如何交會與碰撞在某個偶發的時空，又在這個交會之中創造什麼樣的影響並打開可能的未來。

以我的黑客松田野為例。數位的身體不只是那些會飢餓的肉身，數位的世界是由一連串物質的基礎建設所賦形：固網纜線、基地臺、分享器讓網路得以串接；手機、平板、筆電、液晶電視，讓數位得以現形；螢幕、鍵盤、滑鼠，讓指令得以轉化為互動。除了這些物之外，黑客們也透過眼、耳、手、口來操作機器或是接收訊息：一句「Hey, Siri」，人類的聲音就轉換為機器的指令；手握著滑鼠輕點或拖曳，螢幕中的文字、圖像就能夠在數位空間中移動；一道數位指令在大腦裡蘊釀，經過人類語言到程式語言的轉譯，再經雙手快速敲打在鍵盤上，使之成為黑底白字的演算法，進一步對滿載社會關係的資料、圖像、文字進行運算，使人們看見海量資訊背後可能的規律以及趨勢。在這些過程中，黑客們的身體進一步和數位的元件拼接成為行動的主體。如同我在另一篇文章所描述的：「機器既不是人體的延伸，人體也並未被機器化。人與非人，透過銘刻裝置拼裝、共構，形成一個機動性，隨時可消解的行動體。」

（李梅君 2022）也就是說，數位的身體並非是有機物的系統，而是「力量、流動、強度、激情在具體的空間、時間中凝聚的拼裝」；又或者，是這些力量與流動的介面、是不同強度異質交會、碰撞後產生的火花。

女性主義後人類理論對民族誌展開本體論的挑戰。它提醒我們多重時空與碎形田野並非是田野的新現象，而是身為後人類的我們原本就身處的日常。不論是人類學舊有的主題如夢境、宗教、民俗傳說，或是新關注的媒介如電影、電視、電腦，都曾讓我們同時處於此時此地、也在彼時彼地；同樣的，界線凜然、與世隔絕的田野地從來就不存在，有的只有充滿孔隙的邊界、流動的人物、和四散的線索，等待著田野工作者的參與和擾動。田野工作始終不是抽離的、單一的、完整的。女性主義後人類理論鼓勵我們打開田野工作者的身體，學習以「關照」的實作在無處不數位的當代調整田野的視角、節奏與路徑。

六、關懷與照護的田野倫理

COVID-19疫情期間，因為全球各地大規模的國境封鎖，使得許多人類學家無法前往預定的田野地點，因此轉向網路尋找田野的新機會，這使得原先並

非人類學主流的數位民族誌蔚為風潮。有些新湧入的田野工作者，誤以為數位田野就是上網潛水、爬文、抓資料，偶爾發個文、按按讚就可以稱為數位田野。Gabriele De Seta (2020) 便直白地指出對於數位民族誌三個錯誤的認知：一、以為自己的（數位）田野足跡遍佈各處，是多地點民族誌，卻沒有真的離開田野工作者安逸之居所；二、沒有真正的參與而是純粹潛水偷窺；三、自顧自地發言以為這就算是參與，卻完全沒有理解田野地的文化脈絡。

數位科技或許消彌了田野工作者與研究對象的時空距離，但它並沒有讓參與觀察這個民族誌最基礎的心法變得容易。事實上，數位田野如同所有的民族誌田野，「必然在每一個環節與層次都涉及了田野工作者與田野對象之間的心念交錯、言詞互動、聲色相聞，與肢體應對在這個人我彼此『勾引』而斷續交織的過程中，『他者』無論如何不會只是讓我們獲取書寫材料的『工具』，而是田野工作者必須謙卑討教、努力建立互信、嘗試認真理解與對待的『目的』本身。『田野即目的』的背後，是『迎向她／他者、認納他／她者』的價值選擇與生命倫理實作。」（蔡晏霖、趙恩潔 2019：14）接續著「田野即目的」的思考，我認為後人類理論不但提供數位民族誌在本體論與知識論上的新路徑，其強調即身性的倫理政治（ethico-political）立場讓它呼應並且延伸了人類學家對於民族誌倫理的討論。

後人類取徑的民族誌強調將研究者的「處境」（參考 Haraway 1988）放回民族誌現場。田野工作不再是人類學家從某個熟悉的場域中「離開」後「進入」陌生的田野地，而是田野工作者在參與觀察的過程中「產生了田野地」，田野工作者自身的角色與認同、身體與情感、學術訓練和問題意識也成就了當時當刻湧現的拼裝。在後人類的本體論轉向下，數位田野不再是如Burrell般，跟著網絡的連結去探察不同的節點，而是「投身」在拼裝的湧現之中。此處「投身」的，並非只有有機的身體，更包括了人類學家藉以參與的技術物——不論是紙、筆、相機，或是手機、電腦、網路。每一次的田野都是一場拼裝共構的過程，是人類學家與田野人事物共生而成的一瞬。這並不代表田野研究「不客觀」，後人類取徑強調只有片面的、體現的觀點才能提供客觀視野（Haraway 1988），唯有覺察人類學家投入田野時所帶有的身體與視角，肯認知識的片面與處境，民族誌研究才不會落入普遍主義與相對主義的二分陷阱。

在後人類的取徑下，數位民族誌號召一種「care」（既是「關懷」也是「照顧」，以下簡稱關照）的民族誌關係，以實踐「田野即目的」的倫理實作。關照是一個豐富且多義的詞彙，它一方面意指在情感面上付出關懷（care about）；另一方面則指涉經常被性別化的照護勞動（care for）。關照並非抽象的理論，它們是情動與身體的交織，是身處於變動而多元的社會與文化場景中，面向倫理的日常實作。關照強調即身的互為主體性（embodied intersubjectivity），在每一次實踐的過程中因應不同的場景與關係進行調整和協作（Mol 2008）。

後人類取徑下的關照倫理實作，不僅強調田野工作者的處境與投身，更帶入情感與倫理的拿捏與互動。事實上，民族誌研究本身就是人類學家對一個議題、人群、或事物展開關懷，而田野工作則是相應的照護行動——正因為我們關心、在乎、並且想投身參與，一場田野工作才有可能展開。人類學家從來就不是一個純粹外來的旁觀者，一旦開始田野，人類學家就參與在複雜的人際交流、物我互動之中。不論是成為類親屬的關係、或是被捲入權力鬥爭之中、甚至是引來不情願的金錢或情感糾葛，這些都是人類學家在田野工作中經常遭遇的情事，儘管我們不常把它們寫入公開發表的學術著作中。

關照的倫理實作不僅僅存在於人與人的交流之中，也同樣適用於人與非人、人與技術物的互動之上。技術物並非中性、客觀、不帶任何情感，它們經常參與在關照的實踐裡，也往往需要被小心翼翼地操作（handle with care；參考 Mol 2008）。在 *Matters of Care*（2017）一書中，女性主義學者 Maria Puig de la Bellacasa 將關照延伸到「多於人的世界」（more-than-human worlds）。她指出關照從來就非「純然人性的」，在這個人類無法獨立生存的地球上，我們仰賴著與其它生命、物質、與環境而活，並且無時無刻不與之共創世界。關照正是在這個相互依賴的關係中，盡力去維持、延續、並且修復我們所生存的「多於人的世界」。但是，Puig de la Bellacasa 也引用女性主義對關照研究來提醒我們，關照不永遠是被渴望且令人享受的，它有時建立在權力不對等的勞動之上，有時也包括不舒服、不愉快、甚至令人困擾的互動（Martin, Myers, and Viseu 2015; Murphy 2015）。正是透過女性主義對關照的批判性思考，讓 Puig de la Bellacasa 強調：「關照並不是關於融合；而是關於拿捏對的距離」。Puig

de la Bellacasa認為惟有將關照放回當前知識生產以及科學科技的倫理中，並且時刻注意其中的政治與權力、身體與情動，不試圖去追求完美和唯一解方，而是在每一次的實作中不停地調整、妥協、付出、與接受，才能在充滿憂患的當下尋找「這樣也很好」（as well as possible）的可能性。

在數位田野的場域裡，拿捏對的距離總是需要將技術物放入關照的實作之中。具體而言，這包括去拿捏所身處的數位環境是一個開放的場域或是封閉的場域？參與其中的人們採取匿名或是實名？田野工作者什麼時候可以「潛水」？什麼時候需要浮出水面？以何種方式「現身」才既不突兀但又適當揭露其參與？在數位世界裡的「田野記錄」，像是複製對話、截圖、側錄影音的倫理界線為何？獲取的數位資料又該如何儲存、解讀、歸檔、維護、甚至在適當的時間銷毀？

上述這些提問沒有標準答案，卻是重要的倫理思考。不過，它們仍然停留在「不造成傷害」（do no harm）的層次之上，關照的倫理提供更積極的實作：我的田野現身與參與如何能夠搭建一種關照的互動？我的研究和發表如何能夠回饋並貢獻在該人群或議題上？我如何拿捏自己身處於田野複雜的關係與權力網絡之中？我如何不為了收集資料而田野，而是將田野視作「迎向她／他者、認納他／她者」的價值選擇與生命倫理實作？我如何在田野裡關照她／他者，同時也體認到自己能夠進行田野，正是因為被她／他者所關照著。

關照的倫理實作提醒我們，田野工作大量仰賴著她／他人的協助，並且總是充滿著失敗與不完美。Emily Yates-Doerr（2020）指出人類學家過往追求一種「英雄式」的田野工作，彷彿田野是由一個孤獨的田野工作者，隻身前往陌生地點冒險犯難，而民族誌則是他凱旋而歸的成果。這種充滿英雄氣概的田野故事毋寧是一種殖民暴力的展現，並且複製了學術界裡性別權力的不平等。Yates-Doerr作為一個求職中的母親，在一次帶著兩個稚子重返田野的過程中，因為孩子意外受傷而中斷了田野，過程中得到許多朋友的幫助才得以讓孩子順利完成手術。她從這個「失敗」的田野經驗中提出「反英雄式的關照」（antihero care）的概念，鼓勵田野工作者「不要把一切都放在自己的肩膀上」，不論是親職或是田野工作都不需要一肩扛起，學習仰賴彼此、容許出錯、關心對方、也接受照顧。

以我自身的田野經驗為例。2023年5月初，我和零時政府的伙伴們準備啟程前往韓國濟州島參與面海松（Facing-the-Ocean Hack & Meet）。面海松是臺灣、日本、韓國、香港四地的公民黑客成立於2019年的跨國黑客松活動，旨在透過黑客松進行交流、並且共同打造公民科技專案。面海松在2019年與2020年間分別在日本沖繩與臺灣臺南舉辦，大家白天hacking，晚上吃當地美食、體驗對方的夜生活、並且進行文化交流。眾人跨越語言的藩籬建立起深厚友誼，並且約定好下一年的面海松將在韓國濟州島舉辦。不久之後，Covid-19病毒襲來，疫情關上了國境之間的大門，使得濟州島的約定一直到2023年才終於能夠實現。

2023年面海松舉辦時，我育有一個四歲幼兒，同時也懷有二寶。於是我早早買好機票，並協調家人照顧大寶，準備一人飛往濟州島。沒想到，出發前幾天我開始不正常的出血，婦產科醫師囑咐我要在家臥床安胎不宜遠行。沮喪但又無可奈何的我，在零時政府的聊天室裡發了一條訊息，除了告訴社群朋友們我因為身體狀況無法前往濟州島，也請求朋友「幫我做田野」。我列了幾個原本想去觀察的重點，請他們幫我多看、多聽，回來跟我分享。隔天，一個友人幫我把我的問題謄寫到了零時政府習慣的共筆平臺HackMD上，並且主動地在黑客松當天幫我號召參與者一起書寫。在共筆上，不只許多零時政府的伙伴留言，連韓國的參與者都主動在共筆上分享自己的參與心得。我於是乘勝追擊，在活動結束後邀請面海松的參與者透過視訊跟我聊聊他們此行的經驗和回憶，大家也很大方地把活動期間的照片分享給我。

對錯失到濟州島田野的我來說，那次的線上聊天為我提供了寶貴的故事與材料。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它成為了我田野的一環。我並不是說一場線上訪談就等同於數位田野，而是從我在聊天室裡發下訊息開始，我和社群朋友依著零時政府習慣的方式——在聊天室裡發言、寫共筆、和視訊聊天——展開了一段獨一無二的田野故事。這個田野並非是身為人類學家的我參與了田野中既有的活動（濟州島的面海松），而是我的「無法參與」所誘發的事件。我的身體和處境（身懷六甲無法自由出國）成為了一段田野故事的起點，並打開了原先並不存在的聊天室對話、共筆、視訊；最終，我得以親「身」參與的不一樣的「面海松」。

這段故事顯露出田野過程的不確定性，以及田野工作者是多麼地仰賴田野地伙伴的關照才得以展開研究。田野工作者不是冒險犯難的英雄，也不擁有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當田野是破碎零散，而田野與生活交織進行時，我們需要去接受「關照是一種有選擇性的關注模式：它納入並珍視某些事物、生命或現象作為其關照的對象。在這個過程中，它也排除了它者。」（Martin, Myers, and Viseu 2015）關照的倫理實作正是學習和不完美共存，尋找「這樣也很好」的可能。

七、結語：後人類民族誌的可能

本文透過我在g0v零時政府的田野經驗、對網路與數位相關民族誌的文獻回顧、以及女性主義後人類理論的思索，指出數位田野的流動與開放、多重與碎片，在在敦促我們檢視過往以「人」為核心的民族誌研究，並且指出後人類的民族誌可能。後人類民族誌的關照從人類主體轉向「多於人的世界」，著眼的不再只有做為有機體的人類物種，而是去中心化、動態地與各式生命、能量、物質、與訊息交纏的後人類。而後人類的田野工作者從非外在於其田野對象的研究者。後人類民族誌下的田野工作者，認納自身的角色與認同、身體與情感、學術訓練和問題意識，在在協助她／他在混亂、流動、與去疆界的田野現場尋找各種湧現的線索。民族誌田野工作因而是一個關照的實作，是在永遠無法窮盡與完美，在充滿縫隙與缺陷的田野中，「迎向她／他／它者、認納它／他／她者」的價值選擇與生命倫理實作。

後人類理論看似挑戰了長久以來研究「人」的人類學，卻在許多面向呼應著人類學傳統中，不斷經由與她／他者相交而反思的民族誌倫理。人類學與殖民主義曖昧難解的歷史糾葛，使人類學不斷對「文化」的整體論、「他者」的建構與想像、「西方」的立足與對照反覆的檢討與深刻的辯證。而受到後結構主義及新物質論的影響，這些對本質論與二元對立的挑戰，更在近來催生出本體論轉向、跨物種民族誌與多重宇宙論的討論。這些人類學最新的思潮，都一再與後人類主義相互參考對話。事實上，這些思潮之間的交鋒，反映的是當下我們所面臨的共同議題：在數位與生物科技的高度發展下，基因工程與人工智

慧技術不斷挑戰身為「人」的意涵與其身體界線，使其無法再由人文主義的有機身體觀來解釋。而快速的科技發展背後是高度的資源掠奪，全球不平等與政治經濟衝突加劇，並且同時對生態與環境帶來難以回復的傷害，從全球暖化到COVID-19疫情都顯示出我們面臨的是一個星球角度的災難現場。「後人類」昭示的是一種倫理政治，從獨尊人類這個物種的高傲姿態傾身，肯認混亂與越界的現實，並從之中發展出一套放下身份政治的關係倫理，來試圖「與憂患共存」（Haraway 2016）的姿態。探查人與機器如何碰撞、共構、衝突、互融，揭露科技發展帶來的變革、機會與困境，同時尋求與憂患共存的實作，將是當代人類學家重要的任務之一。

更重要的是，後人類為數位田野指出一條倫理實作的路徑——關照。這裡的關照倫理帶有多重的意涵，它既是Puig de la Bellacasa所強調在多於人的世界中，人與非人如何在充滿挑戰與憂患的當下，不停地調整、妥協、付出、與接受，以打開「這樣也很好」的可能性。同時，關照也是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出發，反對高高在上、充滿英雄主義式的田野工作。我從Yates-Doerr和自身在母職與田野之間拉扯的故事中反思，指出田野工作者不是冒險犯難的英雄，也不擁有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田野工作本身就是一個彼此關照的過程，不只人類學家關照著田野裡的人事物，人類學家也因為被關照著才得以實踐田野。正是因為我們都有所缺陷，才能夠從彼此身上接收故事與能量、情感與知識。

參考書目

何姿瑩

- 2009 公開、私密、非同志：以Spiteful Tots網路社群為例 [Public, Private, Nonconforming: A Case Study of the Spiteful Tots Online Community]。文化研究月報 [Cultural Studies Monthly] 94: 6-17。

李梅君

- 2022 拼裝公民科技：黑客、鄉民、與資料行動主義 [Assembling Civic Technologies: Hackers, Netizens, and Data Activism]。科技、醫療與社會 [Taiwanese Journal for Studie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35: 115-166。

邱淑如、張維安

- 2011 網際網路與紐約福州移民的聯誼會：一個網絡選美事件與家鄉記憶的個案研究 [Internet and the Fellowship Association of the Fuzhou Migrants in New York: A Case Study of Miss Internet and Hometown Memory]。資訊社會研究 [Journal of Cyber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Society] 21: 32-51。

邱誌勇

- 2016 實體與虛擬的並置參與：當代自造者運動的社群集結與想像 [The Juxtaposed Involvement of the Real and the Virtual: The Networks and Inventiveness of the Contemporary Maker Movement]。考古人類學刊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85: 83-108。

林建光

- 2009 身體、科技、政治：後人類主義的幾個問題 [Body, Technoscience, and Politics: Questions Concerning Posthumanism]。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10(3): 14-21。

林瑋嬪

- 2016 線上馬祖：網路社群與地方想像 [Internet Matsu: Online Community and the Reimagination of Place]。考古人類學刊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85: 17-50。

林顯明、廖達琪

- 2019 社群網站與社會資本：比利時臺灣移民使用經驗之初探 [The Social Network Sites Usage Experiences and Social Capital: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in Belgium]。資訊社會研究 [Journal of Cyber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Society] 37: 49-85。

張玉佩

- 2012 初探傳播科技在部落：網咖與蘭嶼原住民日常生活 [Aboriginal Audience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ternet Café in Tao's Everyday Lives]。資訊社會研究 [Journal of Cyber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Society] 23: 96-119。
- 2013 穿梭虛擬世界的遊戲少年：他／她們的社會資本之累積與轉換 [Accumulation and Exchange of Social Capital: Teenage Gamers among Their Families, School, and Game World]。中華傳播學刊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3: 195-227。

范國光、黃彥萍、張豫武

- 2012 虛與實性別化身研究：以魔獸世界探討為基礎 [Virtual and Physical Avatars: A Study Based on MMORPG Players in World of Warcraft]。文化創意產業研究學報 [Journal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Research] 2(4): 371-382。

黃厚銘

- 2017 「真實」的復歸：擴增實境遊戲Ingress社會文化意義之分析 [The Return of the "Real": The Social-Cultural Implication of Ingress]。考古人類學刊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86: 43-68。

管成雲

- 2017 農村網吧裡的孩子們－基於湖北省藕鎮留守兒童互聯網使用與社會交往的民族誌調查 [Children in Rural Internet Café-Ethnographic Investigation on the Internet Us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Ou Town Hubei Province]。新聞學研究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32: 1-59。

劉子愷

- 2017 移動的網絡社會性：佉族青年的手機連結、敘事與網絡 [Networked Soci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Mobile Connectivity, Narrative and Network Among Wa Migrant Youth]。考古人類學刊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86: 5-42。

蔡晏霖、趙恩潔

- 2019 反田野，返田野：給這一輪田野盛世的備忘錄 [Re: Fieldwork, Returning to Fieldwork: A Memo for The Era of Fieldwork Flourishing]。刊於[In]返田野：人類學異托邦故事集 [Re/Turning Fieldwork: Heterotopian Stories of Anthropology]，蔡晏霖、趙恩潔主編。臺北：左岸 [Taipei: Rive Gauche Publishing]。

蕭季樺

- 2017 「盜版者就是盜火者」：字幕組網路社群之禮物文化 [Pirates Are Fire-Bringers: The Gift Culture in Internet-Based Subtitle Groups]。考古人類學刊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85: 111-138。

鄭芳婷

- 2016 數位離散與酷兒想像：以拉板、彩虹山莊及Queerology為例 [Digital Diaspora and Queer Imaginaries: Lesbian Board, Rainbow Village, and Queerology]。考古人類學刊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85: 51-82。

Matthewman, Steve 史提夫·馬修曼

- 2023 技術與社會理論 [Technology and Social Theory]，王志弘、高郁婷譯 [Wang, Chih-hung and Yu-ting Kao, trans.]。臺北：群學 [Taipei: Socio Publishing]。

Aneesh, Aneesh

- 2006 Virtual Migration: The Programming of Globaliza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ellstorff, Tom

- 2008 Coming of Age in Second Life: An Anthropologist Explores the Virtually Hum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oyd, Danah
2014 *It's Complicated: The Social Lives of Networked Teen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raidotti, Rosi
2013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Polity.
- Burrell, Jenna
2009 The Field Site as a Network: A Strategy for Locating Ethnographic Research. *Field Methods* 21(2): 181-199.
- Byler, Darren
2021 *Terror Capitalism: Uyghur Dispossession and Masculinity in a Chinese C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astells, Manuel
2012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Cambridge: Polity.
- Chang, Chun-Chih, and Thung-Hong Lin
2020 Autocracy Login: Internet Censorship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Digital Age. *Democratization* 27(5): 874c895.
- Coleman, Gabriella
2013 *Coding Freedom: The Ethics and Aesthetics of Hack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Hacker, Hoaxer, Whistleblower, Spy: The Many Faces of Anonymous*. London, New York: Verso.
- De la Cadena, Marisol, and Mario Blaser
2018 *A World of Many World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De Seta, Gabriele
2020 Three Lies of Digital Ethnography. *Journal of Digital Social Research* 2(1): 77-97.
- Delfanti, Alessandro
2021 *The Warehouse: Workers and Robots at Amazon*. London: Pluto Press.
- Descola, Philippe
2013 *Beyond Nature and Culture*. Janet Lloyd,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nglish-Lueck, J.
2002 *Cultures@SiliconValle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Escobar, Arturo
2017 Sustaining the Pluriverse: The Political Ontology of Territorial Struggles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Anthropology of Sustainability: Beyond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Marc Brightman and Jerome Lewis, eds. Pp. 237-256.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Escobar, Arturo, David Hess, Isabel Licha, Will Sibley, Marilyn Strathern, and Judith Sutz
1994 Welcome to Cyberia: Notes on the Anthropology of Cyberculture [and Comments and Reply]. *Current Anthropology* 35(3): 211-231.
- Fabros, Alinaya
2016 *Outsourceable Selves: An Ethnography of Call Center Work in a Global Economy of Signs and Selv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Gershon, Ilana
2010 *The Breakup 2.0: Disconnecting over New Media*. Ithaca an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ray, Mary L., and Siddharth Suri
2019 *Ghost Work: How to Stop Silicon Valley from Building a New Global Underclass*. Boston: Eamon Dolan Books.
- Haraway, Donna
1988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14(3): 575-599.
2006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In*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Joel Weiss, Jason Nolan, Jeremy Hunsinger, and Peter Trifonas, eds. Pp. 117-158. Netherlands: Springer Netherlands.
2016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Hayles, N. Katherine
1999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ine, Christine
2015 *Ethnography for the Internet: Embedded, Embodied and Everyday*.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 Holbraad, Martin, and Morten Axel Pedersen
2017 *The Ontological Turn: An Anthropological Exposi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lbraad, Martin, Morten Axel Pedersen, and 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
2014 The Politics of Ontology: Anthropological Positions. *Fieldsights, Cultural Anthropology*.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the-politics-of-ontology-anthropological-positions>. Accessed September 6, 2023.
- Irani, Lilly
2019 *Chasing Innov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 Ito, Mizuko, Daisuke Okabe, and Misa Matsuda
2005 *Personal, Portable, Pedestrian: Mobile Phones in Japanese Life*. Cambridge, US: MIT Press.

- Johnson, Alix
2019 Data Centers as Infrastructural In-Betweens: Expanding Connections and Enduring Marginalities in Iceland. *American Ethnologist* 46(1): 75-88.
- Juris, Jeffrey S.
2008 *Networking Futures: The Movements Against Corporate Globaliza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 Karanović, Jelena
2012 Free Software and the Politics of Sharing. In *Digital Anthropology*. H. Horst and D. Miller, eds. Pp. 225-241. London; New York: Berg.
- Kelty, Christopher M.
2008 *Two Bit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Free Softwa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Kirksey, S. Eben, and Stefan Helmreich
2010 The Emergence of Multispecies Ethnography. *Cultural Anthropology* 25(4): 545-576.
- Kohn, Eduardo
2013 *How Forests Think: Toward an Anthropology Beyond the Hum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atour, Bruno
1993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Catherine Porter, trans. Cambridge, U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ndtner, Silvia M.
2020 *Prototype Nation: China and the Contested Promise of Innov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ukács, Gabriella
2020 *Invisibility by Design: Women and Labor in Japan's Digital Econom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Lupton, Deborah.
2016 *The Quantified Self*.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 Marcus, George E.
1995 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4: 95-117.
- Martin, Aryn, Natasha Myers, and Ana Viseu
2015 The Politics of Care in Technoscienc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5(5): 625-641.
- Maurer, Bill
2012 Mobile Money: Communication, Consumption and Change in the Payments Spac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8(5): 589-604.

- Miller, Daniel
 2011 *Tales from Facebook*. Cambridge and Oxford: Polity.
- Miller, Daniel, and Don Slater
 2000 *The Internet: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Oxford,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 Mol, Annemarie
 2008 *The Logic of Care: Health and the Problem of Patient Choice*. London: Routledge.
- Morozov, Evgeny
 2011 *The Net Delusion: 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 Murphy, Michelle
 2015 *Unsettling Care: Troubling Transnational Itineraries of Care in Feminist Health Practice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5(5): 717-737.
- Nardi, Bonnie
 2010 *My Life as a Night Elf Priest: An Anthropological Account of World of Warcraf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Pasquale, Frank
 2015 *The Black Box Society: The Secret Algorithms That Control Money and Information*. Cambridge, U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ink, Sarah
 2020 *Home Truths: Gender, Domestic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Routledge.
- Pink, Sarah, Heather Horst, John Postill, Larissa Hjorth, Tania Lewis, and Jo Tacchi
 2015 *Digital Ethnograph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 Postill, John
 2018 *The Rise of Nerd Politics*. London: Pluto Press.
- Puig de La Bellacasa, Maria
 2017 *Matters of Care: Speculative Ethics in More than Human World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chüll, Natasha Dow
 2012 *Addiction by Desig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inpeng, Aim
 2020 *Digital Media, Political Authoritarianism, and Internet Controls in Southeast Asi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2(1): 25-39.
- Smith, James H.
 2011 *Tantalus in the Digital Age: Coltan Ore, Temporal Dispossession, and 'Movement' in the Eastern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American Ethnologist* 38(1): 17-35.

- Tkacz, Nathaniel
 2015 *Wikipedia and the Politics of Openn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sing, Anna Lowenhaupt
 2015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Viveiros de Castro, Eduardo
 1998 Cosmological Deixis and Amerindian Perspectivism.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4(3): 469-488.
 2004 Perspectival Anthropology and the Method of Controlled Equivocation. *Tipiti: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Anthropology of Lowland South America* 2(1): 3-22.
- Wilcox, Lauren.
 2017 Embodying Algorithmic War: Gender, Race, and the Posthuman in Drone Warfare. *Security Dialogue* 48(1): 11-28.
- Xiang, Biao
 2007 *Global "Body Shopping": An Indian Labor System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Yates-Doerr, Emily
 2020 Antihero Care: On Fieldwork and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45(2): 233-244.
- Zhang, Lin
 2023 *The Labor of Reinvention: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New Chinese Digital Econom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Zuboff, Shoshana
 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New York: Hachette Book Group.

李梅君

115601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mclee@gate.sinica.edu.tw

When Ethnography Meets Posthuman:

Assemblage and Care in Digital Fieldwork

Mei-chun Le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Digital ethnography emerged in respons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t challenged the assumption that fieldwork requires a long-term presence in one location and transcends the limitations of physical space.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can now take place remotely and across various dimensions of space-time, allowing ethnographers to no longer be confined by their biological bodies.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by breaking the dichotomy of online/offline and virtual/real and addressing social changes alongsid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digital anthropology has established itself as an important sub-field in anthropology. However, past digital ethnographers often treated “humans” as actors and subjects while considering “technology” as media and objects. This perspective overlooks the fact that our digital activities rely on the assemblage of humans and machines, neither of which is the sole actor. Digital ethnographers’ bodies are extended, expanded, duplicated, and teleported by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conduct fieldwork and move across multiple dimensions of space-time. Meanwhile, the subjects of study in digital ethnography are not merely humans and their collectives but are hybrids assembled with various human and non-human parts and entities.

This article draws on my reflection of conducting digital ethnography with the civic tech community, g0v (pronounced gov-zero), in Taiwan. The embodied experience of digital fieldwork prompts me to rethink how ethnographers incorporate non-humans and machines into our research and consider how ethnographers’ bodies, situatedness, and materials brought into the field facilitate and shape our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this article, I introduce feminist posthumanism and posit the necessity of a “posthuman” reorientation of digital ethnography. This shift transcends the confines of Internet or online ethnography to encompass a broader understanding of how our encounters with the digital invariably intersect with corporeality, materiality, infrastructure, and atmosphere.

Feminist posthumanism signifies an ethical politics that humbles anthropocentric arrogance, recognizing the realities of chaos and transgression in and across every field. It develops a relational ethics that lets go of identity politics, aiming to “stay with the trouble.” A posthuman turn challenges anthropocentric ethnographic writing and unsettles the binary between humans and machines, subjects and objects, researchers and the researched in digital fieldwork. Feminist posthumanism calls our attention to our posthuman bodies as we seek to understand how our digital life is constantly mediated, materialized, connected, and disconnected. It not only brings an ont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turn to digital anthropology but also urges ethnographers to adopt an ethical critique and practice of “care.” This practice emphasizes the ethnographer’s situatedness and engagement, incorporating the nuances of affective and ethical interactions. Indeed, ethnographic research is an anthropologist’s expression of care for a topic, group, or thing, and fieldwork is the corresponding act of care. It is our care and desire to engage that make fieldwork possible.

The ethical practice of care in fieldwork applies to human-to-human and human-to-non-human. It involves considering whether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is open or closed, whether participants are anonymous or using real names, and when a fieldworker can “lurk” or should surface. It includes the manner of “appearing” appropriately, the ethical boundaries for copying conversations, taking screenshots, and recording audio or video. It addresses how digital data should be stored, interpreted, archived, maintained, and destroyed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Beyond “do no harm,” care involves establishing caring interactions with humans and non-humans, navigating complex relationships and power networks, and recognizing that conducting fieldwork is possible because of being cared for by others.

In summary, the integration of feminist posthumanism into digital ethnography not only challenges traditional anthropocentric perspectives but also fosters a deeper, more rel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digital life. By emphasizing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humans, non-humans, and technologies, and by adopting an ethical practice of care, digital ethnographers can more effectively navigate the complexities of contemporary digital environments. This approach ensures that their research remains ethically grounded and relevant in a rapidly evolving digital landscape.

Keywords: digital ethnography, feminist posthumanism, assemblage, care, fieldwork ethics
